

数码启蒙主义三重解

黄鸣奋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数码启蒙主义继承了传统启蒙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社会使命感,同时又正视传统启蒙主义在20世纪中叶以来所面临的挑战,致力于捕获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不断深入所创造的新机遇,将数字化生存条件下公众价值定向、艺术教育理念和异类涵化原则统一起来。它肯定上述信息革命是人类智慧和进步的新契机,特别关注网络时代东方对西方、少者对老者、乡村对城市的思想影响;肯定数码技术在当前艺术教育中日益显著的作用,将启蒙理解为每个社会成员不断接受教育、更新自我的过程;肯定数码艺术是激浊扬清的重要手段,努力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跨学科艺术人才;肯定异类涵化的重要性,让人类有可能在将来适应数码生物崛起所带来的变化;主张未雨绸缪、尽早探讨如何对数码生物进行人为启蒙的问题,并致力于开创与建设人与数码生物互惠共生的新态势。

关键词: 信息革命; 启蒙主义; 艺术教育; 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 G201; J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420(2015)01-0001-09

DOI: 10.14132/j.cnki.nysk.2015.01.001

启蒙体现人类趋于自觉与成熟,是贯穿人类思想史的重要发展线索。启蒙主义(didacticism)则是西方源远流长的一种哲学观念,早先以强调文学艺术的教育性为要旨。古希腊语 διδακτικός(didaktikos)一词表示以迷人而有趣的方式进行教学,这种观念被认为是启蒙主义之发端。诗人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作家色诺芬《论马术》等是其名篇。启蒙主义在18世纪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The Enlightenment)。它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与封建专制、宗教迷信抗争,一方面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观念,另一方面宣传无神论、自然神论或唯物论(下文在这一意义上称之为传统启蒙主义)。本文所探讨的数码启蒙主义诞生于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革命的浪潮之中。它并非传统启蒙主

义在数码时代的简单翻版,而是数字化生存条件下社会价值定向、艺术教育理念和异类涵化原则的统一。

一、作为社会价值定向的数码启蒙主义

从历史上看,信息革命有助于启蒙主义实现其目标。以语言为标志的第一次信息革命促进人猿相揖别,开启了启蒙的历史进程。以文字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导致书本的出现,助推了知识的传播,促进了轴心时期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变革。以印刷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促成了知识的大众化,有利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的发展、报刊的兴起,以至于西方启蒙运动的到来。以电磁波为标志的第四次信

收稿日期: 2015-01-03

作者简介: 黄鸣奋,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赛伯文化和数码艺术理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13BA008)

息革命推动了启蒙意识形态的远程即时传播,使之得以更深入地贯彻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为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管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而将启蒙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事业(即自我教育)。数码启蒙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崛起的。

1. 继承传统启蒙主义的精神

启蒙思想在数码时代仍然有其生命力。例如,当前西方流行的超人主义哲学植根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中。19世纪俄国哲学家费奥多罗夫宣传激进的生命扩展、身体不朽,以至运用科学方法死而复活^[1]。这是它的前驱之一。又如,利用人机交互进行创作的设想由来已久,英国启蒙运动激进派创始人斯威夫特(1667—1745)在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中所描写的拉格多科学院教授的写作方法就是其滥觞^{[2]168-170}。数码时代标领风骚的量化研究和计算主义,也可以在启蒙主义中找到渊源。正如巴西学者格拉所指出的:机器不只是西方文化的人造物,而且已经变成了思想和关系的模式。宇宙渐渐被理解为由固定规则支配的巨大机器,可以通过观察和精神推测来发现,以数学的语言来表达。这种态度最初出现在物理学,但很快就扩展到所有知识领域,如生物学、语言学、社会科学和音乐。机械化最初被用于取代沉重的工作,正如工业革命时期那样。然而,它作为观念至少同样古老。例如,它可以在理性特权的启蒙理想中、在由法律支配的官僚国家对国王权力的取代中找到,也能在形式语言的发展中找到。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们都搜索一种客观的决定,以便让有效的机器能够得出不依赖于所涉及的人的决定。所缺乏的是“决定机器”。当电子计算机被开发出来时,它满足了这一需要,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对大规模自动决定做出尝试^{[3]207-208 218}。

数码启蒙主义肯定传统启蒙主义对繁荣科学、弘扬民主的历史性贡献,与传统启蒙主义一样看重理性、科学和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它并不满足于祖述其先驱的思想,而是致力于运用当代信息技术进行历史研究,以期加深人们对于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的了解。2008年起由斯坦福大学牵头实施的“映射文坛共和国”(Mapp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项

目就是例证之一。它的研究对象是当年启蒙思想家之间的通信、旅行和交往,支撑技术是巨量数据视觉化。如今,“数码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被科恩等人称为“新的启蒙”^[4]。它最初是指将计算分析方法用于大规模收藏数码格式的文艺作品档案,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方法论、一种日趋重要的社会实践。

2. 正视传统启蒙主义的危机

进入数码时代之后,传统启蒙主义受到各种挑战。例如,美国爱荷华大学莫里斯《新媒体诗学:正如我们所思/如何写作》一文指出:从后人类的观点看,我们并不是启蒙思想家所想象的有界的、自主的、一贯的、完全自我意识的存在物,而是由媒体及信息技术加入持续性反馈回路的控制论有机体^{[5]1-46}。

数码启蒙主义是在传统启蒙主义遭受到后现代主义冲击而丧失其魅力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后现代主义质疑传统启蒙主义所守护与宣扬的各种宏大叙事,认为它们并非不证自明的公理。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利奥塔将“后现代”一词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所谓“元叙事”(metanarratives)被利奥塔视为现代性的标志,其基本内容包括理性和自由的进一步解放,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科学的进步实现整个人类的富有,以及通过让灵魂皈依献身的爱的基督教叙事使人们得救等。这些元叙事在思辨意义上的代表是黑格尔哲学,在解放意义上的代表是启蒙运动。利奥塔引导读者关注元叙事崩溃的事实,并对这种崩溃表示欢迎。他不同意某些人关于“这种崩溃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瓦解和社会集体向一种离散状态的过渡,个体原子被抛入荒谬的布朗运动”的看法,因为原先的“有机”社会并非乐园。利奥塔认为:在元叙事崩溃之后,“‘自我’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并不孤立,它处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多变的关系网中。不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男人还是女人、富人还是穷人,都始终处在交流线路的一些‘节点’上,尽管它们极其微小。”在这里,他采用了系统理论的术语,将整个社会设想为由传播网络组成的系统,在其间流动的信息可以相互交汇并再分配,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数码革命的相通之处。虽然它们所关注的网络往往具备不同含义,不

过,利奥塔等人极力反对包括社会解放和思想启蒙在内的所谓“宏大叙事”,主张教育的目标不是树立理想而是发展能力。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支持数据网络的社会应用。利奥塔说:“对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存储网络更有能力;对想象新的招数或新的游戏而言,教师也并不比跨学科集体更有能力。”这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6]引自 2,32,111}。

数码启蒙主义曾经和后现代主义站在同一条战壕中挑战传统启蒙主义的权威,因为它必须为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信息科技和数码媒体开辟创新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它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倾向,即对西方近现代所习见的人文的、自由的、理性的尺度表示怀疑,否认纯粹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质疑关于文字、文本和人自身的传统观念。在数码启蒙主义看来,当今时代公众已经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由自诩为社会良知之代表的权力精英或知识精英启蒙的对象。不过,数码媒体确实又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和科学知识传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正因为如此,数码启蒙主义正视数码媒体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它从控制论有机体的角度理解启蒙,阐释媒体、信息技术和反馈在启蒙中的作用,为基于自我教育的启蒙寻找理论依据。

3. 理解数码启蒙主义的要旨

数码启蒙主义在实践中的推广,有过以下取向:(1)在印刷媒体、模拟电子媒体占主导的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逐渐熟悉并应用数码媒体,形成互联网思维;(2)数码革命所包含的新思想、新观念从率先兴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向其后续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家扩展;(3)随着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成和普及,传播新格局形成。过去总是说西方启蒙东方,老者启蒙少者,城市启蒙乡村,如今,方向相反的信息流动、知识流动和价值观流传已经逐渐成为网络时代的新常态。且不说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是否“东方启蒙西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验和成就明显是对于人类历史的卓越贡献,已经为许多西方人所瞩目,中国网民群体所发出的声音同样为许多西方人所倾听;在新媒体应用领域,年轻人往往比年长者更有发言权,很多老人家的网络知识、技能

和观念系向儿孙辈学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法制社会建设过程中,那些征地拆迁等引发的冲突因网络介入而成为公共事件,使原先默默无闻的村民变成主角,倒逼着生活在城市中的社会管理层做出废除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决策。随着数码革命的深入,这类现象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

蒙昧既是指未曾开化的原始状态,又是指不通事理的糊涂状态。智慧既是指知书识礼的文明状态,又是指洞达时务的颖悟状态。因此,所谓“启蒙”经常意味着以智慧取代蒙昧,以进步取代落后。智慧和进步成为启蒙主义的关键词。在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倡导者将给世界带来光明作为目标,希望摆脱传统教义、非理性与盲目性。受他们影响,有许多人将传播现代科学与西式民主作为自己的使命,对所属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做出努力。尽管如此,启蒙理想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例如,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柯克斯维尔分校埃迪斯等人指出:在过去若干世纪,大多数穆斯林都遇到过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现代科学。为了避免被技术先进的国家所享有的军事和商业优势所压倒,中东穆斯林社会必须开始采用现代知识。当西方化开始塑造社会结构和制度以及技术时,保守的穆斯林对现代科学的反应通常变得为文化防范的需要所制约。许多穆斯林思想家认为:坚持穆斯林文明的宗教性,意味着借用技术但抵制弥漫于现代科学概念框架中的物质主义。这种防守方式在当前穆斯林关于科学的思考仍然是突出的。几乎所有宗教定向的穆斯林思想家将科学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和谐当成理所当然之事,但在实践中,保守的穆斯林经常表达对支配现代科学的自然主义观点的深刻保留。尤其是在通俗文学中,出于宗教动机而扭曲科学的现象是常见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排斥的特定目标^{[7]663-1690}。如今,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的双刃剑性质,以及西式民主的局限性。因此,数码启蒙主义并不盲从于当年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各种观念,而是关注启蒙运动推进和公共领域开拓的关系,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信息革命和数码媒体的潜能。

第五次信息革命是否给人类带来智慧和进步的新契机?数码启蒙主义对此的回答是肯定

的。它认为:信息技术发展不仅有利于科学精神的昌明,而且多多少少推动社会朝更加符合人道原则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意义上,信息技术的进步本身就体现了作为历史过程的启蒙。如何把握上述契机呢?数码启蒙主义认为:(1)应当致力于提高公民的信息素质,使之掌握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所需要的信息技能;(2)应当尽可能推广与信息革命深入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互联网思维,使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用户心理模式的转变相适应;(3)应当大力发挥信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龙头作用。

数码启蒙主义并不认为启蒙者是某些人相对固定的身份,也不认为启蒙就是宣扬某种相对固定的思想模式或价值体系,而是将蒙昧作为某种丧失清醒自觉性的状态来加以考察,具体分析它之所以产生的条件和加以纠正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一度被认为蒙昧或迷信的传统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经过重新阐释而获得生命力,像我国古代基于天人合一的养生保健观等就是如此。相比之下,某些被启蒙思想家当成天经地义的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可能受到质疑。有鉴于此,数码启蒙主义虽然肯定启蒙的重要性,但也注意到启蒙者本身可能存在的盲点,因此承认启蒙转化为蒙昧的可能性,警惕人们以启蒙者自居时过度自以为是造成的危害。在这一意义上,数码启蒙主义包含了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它并不认为数码科技是万能的,而且对信息崇拜或数码拜物教保持应有的警惕。考虑到信息科技迅速发展、数码革命不断深入的实际,启蒙实际上是每个社会成员不断接受教育、更新自我的过程。

在更宏观的背景中,启蒙应当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协商过程,而不应是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代名词。我们不难从《阿凡达》之类的数码大片中发现有识之士对于所谓“文明”和“愚昧”的反思。影片所认同的并不是以高科技文明为依托的人类星际殖民者,而是潘多拉星球仅仅具备原始智慧的土著,其中起作用的标准是宇宙生态主义。虽然这是一部科幻片,但其中的情节无疑是以我们当前的现实为参照系而构思的。无论如何,追求真理、摆脱蒙昧,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事业。换言之,启蒙的目标只有依靠群策群力

才能实现。它的必要前提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正是数码时代“交互”、“参与”等范畴在宏观上的要旨。

二、作为艺术教育理念的数码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在历史上曾经作为艺术教育理念而发挥作用,所谓“以美育代宗教”的观念是上述作用的集中反映。数码启蒙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这一传统,但又顺应第五次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动而致力于改革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数码启蒙主义和数码艺术教育是互为表里的。数码启蒙主义是数码艺术教育的理论指南,数码艺术教育则是数码启蒙主义的有力支持。数码艺术教育至少包含以下三重意义:一是运用数码手段进行艺术教育(读为“数码+艺术教育”),二是运用数码艺术进行教育(读为“数码艺术+教育”),三是开展针对数码时代艺术发展的教育(读为“数码+艺术+教育”)。在第一重意义上,数码启蒙主义肯定数码技术在当前艺术教育中日益显著的作用;在第二重意义上,数码启蒙主义将数码艺术作为激浊扬清的重要手段;在第三重意义上,数码启蒙主义致力于确立数码艺术人才培养目标,推动数码艺术创作、传播和鉴赏的有机结合。

1. 发挥数码技术对艺术教育的促进作用

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社会条件相适应,艺术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分别以家教式、师徒式和院校式等为主导的状况。进入数码时代以来,电脑教学、网络教学、移动教学等在艺术教育中所占有的地位日趋重要。数码启蒙主义因此高度肯定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对当前艺术教育的促进作用,认为计算机的普及确实应当从娃娃抓起。不仅如此,数码启蒙主义认为艺术教育应当顺应数码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到教学方式都是如此。随着大数据浪潮的到来,计算机辅助艺术教育应当将重点从把单机当成艺术工具转变到利用云计算处理艺术信息,充分利用云计算所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软件服务以至于开发平台服务。

从教育的角度看,西方艺术界自启蒙运动之后屡经变迁。前现代时期,浪漫主义、批判现实

主义等艺术群体充当社会良知的代表,其作品是艺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为艺术评论家和艺术研究所重视。其后,现代艺术家逐渐丧失了先前所拥有的引领教化的作用,艺术教育日益成为受众自我发现、自我调适的过程。后现代时期,“零度写作”成为某些艺术家的追求,受众则围绕文本尽情狂欢。进入数码时代之后,启蒙与其说是由某些造诣精深的人文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地为公众(甚至是他们眼中的群氓)指点迷津,还不如说是由新媒体用户在适当设计的情境中所进行的自我教育,DIY受到空前的青睐。除此之外,后喻文化的流行导致对传统艺术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例如,在民间故事中,老祖母经常是智慧的化身。她们在孙辈临睡前所讲述的故事不仅将孩子们带入富有诗意的梦乡,而且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初的启蒙,让他们终身受用无穷。费伦、欧康纳的动画作品《格林奶奶的睡美人》(Granny O' Grimm's Sleeping Beauty, 2008)却反其道而行之,揭示了这种教育的另一面。它所塑造的主人公没有给小孙女带来安宁,这不只是由于她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充满了恐怖和怨恨,单单她讲述过程中时而平静时而狂怒的态度就让孩子充满恐惧。

某些数码艺术先驱敏锐地意识到上述变化。例如,1990年,英国的阿斯科特《在远程拥抱中有爱吗》一文指出:过去数十年中,两支强大的技术(指计算与电信)汇聚到一个操作领域,将其他电子媒体(包括视频、声音合成、遥感与多种控制系统)拉入它的怀抱。这些现象对个体及社会发生了巨大影响:它们使什么是人类、什么是创造性、什么是思维、知觉,连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与作为整体的星球的关系都成为问题。伴随上述发展而产生的“远程信息处理文化”包含一系列的行为、观念、媒体、价值与目标,它们与启蒙运动以来塑造社会的东西显著不同。新的文化的与科学的隐喻和范式正在产生,现实的新模式与呈现正在发明,新的表现手段正在制造。根据阿斯科特的看法,在远程信息处理艺术中,意义不是由艺术家所创造、通过网络传播给接受者,并为观察者所接受。意义是观察与系统交互作用的产品,是处于流动、无穷变化与变形状态的内容。这种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状况并非简

单地由于网络用户的交叉往来互动,而是由于内容具体化为本身是非物质性的数据。这些数据只是纯粹电子的不同,直到它在作为图像、文本或声音的界面被重建为止。我们因此可以认为艺术栖身于文化交流系统(而非作为固定的语义配置的艺术对象)之中,观者正是活跃地与上述系统进行交流以探寻意义所在^{[8]232}。2006年以来,“翻转课堂”(Flipping the Classroom)由美国向其他国家推广。它充分发挥数码视频在线传播的作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学模式,给艺术教育带来了新思路。虽然慕课本身并不是充分自足而完美的教学方式,但毕竟已经展示了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授课者和学习者通过某一个共同的话题或主题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这正是数码艺术教育所迫切需要的。

2. 重视数码艺术激浊扬清的社会功能

数码艺术既是传统艺术在数码时代的延伸(因此而有数码音乐、数码美术、数码文学、数码戏剧、数码影视等),又是增值服务在艺术领域的应用(因此而有BBS艺术、主页艺术、博客艺术、微博艺术等)。数码艺术一方面以其所依托的主要平台(即网络)的信息共享和舆情氛围充当开放、互联、民主价值的证明,另一方面又以其所包含的技术含量显示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数码艺术还和传统艺术一样能够发挥激浊扬清的社会作用。正因为如此,数码启蒙主义顺理成章地将数码艺术当成自己最主要的推广对象之一,并利用数码艺术的魅力来传播自己的理念。

与传统启蒙主义一样,数码启蒙主义将反启蒙主义(Obscurantism,一译蒙昧主义)当作自己的对立面。Obscurantism一词来自拉丁语的obscurans(意为黑暗化),指蓄意防止事实或某种事情的细节为人所知。在历史上,它可能是指有意限制知识的传播、妨碍公众了解真相,也可能是指文艺领域的深奥难懂(故意朦胧)。数码启蒙主义一方面将推动知识(特别是数码科技普及)当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艰深文浅陋。

就艺术功能观而言,数码启蒙主义和传统启蒙主义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传统启蒙主义所青睐的是基于脑力(而非体力)的“斯文的交互”,

不论是作为审美要旨的静观默察,还是戏剧中的“第四堵墙”,都隐含了这种倾向。相比之下,数码启蒙主义则提醒人们注意基于身体的“操作的交互”。英国林肯大学罗兰(Duncan Rowland)等人甚至设计了一种可以拳重击的娱乐系统,称之为“暴力的交互”。他们认为:这是对现代心照不宣地看好某类用户(在语言和技术方面有天赋)而疏远另一类用户(在身体上有天赋)的系统的批判和反拨^{[9]215-229}。虽然这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基于触摸屏的艺术APP、体感游戏、增强现实艺术等都已经表现出重视操作性交互的倾向,并为数码启蒙主义所关注。当然,它所要求的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努力将“斯文”和“操作”、心智和身体、作为观念的艺术和作为技能的艺术有机结合起来。

3. 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跨学科艺术人才

就艺术教育而言,数码启蒙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传统启蒙主义的某些特征。主要表现如下:(1)某些数码艺术作品尽管是在新媒体时代创作与传播的,却仍然保留启蒙传播的特点,即坦率的倾向性和教训性;(2)在传统启蒙主义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某些精品,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仍然获得重视;(3)传统启蒙主义唤起人们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视、对相关艺术珍品的收藏,数码启蒙主义同样重视优秀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不过,“艺术”作为观念是历史的。譬如,古希腊人所理解的艺术主要是(但不限于,下同)自由艺术和公共艺术;中世纪欧洲人所理解的艺术主要是宗教艺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所理解的艺术主要是美的艺术;后现代以来西方人所理解的艺术逐渐拓展到反艺术、非艺术。相比之下,数码启蒙主义推重技术艺术。这并非意味着否定其他艺术类型的价值,而是强调科技和艺术相统一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大趋势。它致力于消除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所造成的缺乏社会担当、理想追求的流弊,将艺术与科技交融当成当前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从而形成与之相应的数码艺术教育特色;适应多媒体、流媒体、超媒体、全媒体等艺术样态发展的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划分所造成的限制,以人才的全面发展为旨归。

三、作为异类涵化原则的数码启蒙主义

与传统启蒙主义相比,数码启蒙主义面临着第五次信息革命深入发展所造成的新的历史条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形形色色的数码生命的出现。它不仅包括已经作为宠物或玩具为儿童所熟悉的虚拟生命,而且包括在工业生产、社会服务、军事斗争、娱乐消遣等领域崭露头角的智能机器人,还包括在银幕、荧屏或显示器上大放异彩的各种人造生物。数码启蒙主义因此肩负起调适异类的历史使命。

1. 让人类适应数码生物崛起所带来的变化

20世纪末以来,下述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1)数码玩具络绎上市。例如,日本万代公司先后发布了名为“电子鸡”(Tamagotchi, 1996)和“数码怪物”(The Digital Monster, 1997)的电子宠物,分别迎合女孩和男孩的需要。(2)机器人陆续进入家庭,担负起家务料理、客人招待等任务。这种趋势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而变得格外明显。(3)无人机日益频繁参战,其自主袭击的可能性引发人们对“机器人杀人”的担忧。在理论上,已经出现了某些用于解释人类对机器人心理反应的假设。例如,机器人专家森政弘认为机器人与其他人类摹本如果外观与行动都像真人,那会在人类观察者中激起强烈反感。他用“恐怖谷”来概括这一现象。2002年,温哥华艺术家格伦维尔策划了以“恐怖谷:电子人文化中的实验”为题的展览,并出版了同名论文集^[10]。

数码生物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以机器人进入教育领域为例,大致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等级:(1)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或学科课程;(2)作为专门化的教学手段或工具;(3)在教学管理活动中发挥辅助作用;(4)作为代理完成本由教师或学生承担的某些事务;(5)作为主持人负责组织整个教学活动。当然,上述等级分别对应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机器人。为了适应机器人的地位变化,所谓“机器人启蒙教育”至少有五种不同的取向:一是研究概念机器人、科幻机器人等在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二是对人类(通常指儿童)进行有关机器人知识的教育;三是运用机器人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教育;四是对

智能机器人进行有关人类要求的教育;五是引导智能机器人进行自我教育。至于智能机器人能否自主对人(至少是人类新生个体)进行启蒙教育,那是另一个意义上的问题。

数码启蒙主义高度关注数码生物崛起所引发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变化。当年传统启蒙主义者因受机器在物质生产领域获得日益广泛应用的影响等原因,对人的本质产生了新的认识。例如,法国启蒙哲学家拉·梅特里(1709—1751)说“人是一架机器;在整个宇宙里只存在一个实体,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种变化。”^{[11]73}在艺术实践中,人与机器的相通之处也被当作创作题材。例如,在德国鲍豪斯戏剧工作坊史雷梅尔所创作的《木偶》中,演员的身体通过运用由零件的机械化系统组成的舞台服装转变成了机器。1982年1月24日的《日本经济新闻》所发表的《一月之诗·机器人》描述了作者井上靖所知的一个五岁男孩的故事:他经常担心自己是不是机器人,妈妈想方设法来安慰他,但仍无法解除他的疑虑。对于这样一个经常观看动画片的幼童来说,产生这样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诗中对于这个幼童的疑虑的描写,事实上是诗人自身反省的表现。如今,人们借助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所建立的新的参考系来进行人性研究,加拿大学者穆里的论文《启蒙电子人:人机交流与控制史(1660—1830)》就是如此^{[12]17-19,252}。

2. 对数码生物进行人为启蒙

对数码生物进行人为启蒙的必要性,是由于预计到它们趋于成长、成熟的可能性而产生的。西方科幻小说的鼻祖《弗兰肯斯坦》已经接触到由科学家所造的智能生物融入人类社会之困难。20世纪初,捷克作家恰佩克在其剧本《洛桑万能机器人》(R. U. R.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 1921)中描写机器人造反,从反面强调了对人造生命进行引导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不仅构思了机器人三定律,而且考虑到机器人成长过程中所可能碰到的各种矛盾。

就近年来已知科幻作品而言,有关数码生物启蒙教育的描写至少涉及如下情况:(1)让计算机理解人类的价值体系;(2)让机器人接受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3)让基因工程所创造的各种怪物与人类和平共处。例如,美国电视科幻连

续剧《传世》(Extant, 2014)描写人工智能专家伍兹为弥补结婚多年没有子嗣的遗憾,制造了名为humanich的小男孩机器人当儿子,并谆谆教导他如何与人类相处。如果说这是相对乌托邦的作品的话,那么,高蒙电影公司《人兽杂交》(Splice, 又译“人工进化”、“颤栗异种”, 2010)则充满了恶托邦想象。影片中,顶尖的基因科学家艾尔莎和克里夫出于猎奇心理造出了半人半兽女混血儿卓伦,虽然教会它理解人类语言,却没有教会它如何与人相处。最后克里夫被性别发生变异的卓伦所杀。艾尔莎灭了这个凶手,自己却已经怀了其孩子,真是悲剧。它从反面说明了数码生物启蒙的重要性。这类描写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现实根据的。当代数码生物的发展水平离科幻作品的描写存在不小的距离。尽管如此,考虑到数码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面向数码生物的启蒙教育成为社会需求的时间,也许比目前我们所能想象的要早。巴西/美国艺术家卡茨之所以想将自己在实验室造出、在艺术馆展览的转基因兔子领回家一道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上述需求的先兆。

3. 建设人与数码生物共处的新生态

正如西安交通大学李慧等人所指出的“主体意识唤醒了人类的自觉精神,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助长了人类的自大与独裁等缺陷。尤其在西方世界,经过启蒙运动鼓吹起来的主体意识已经广受批判。”^[13]启蒙思想家将人视为自然的主人,结果导致对自然的掠夺。有鉴于此,数码启蒙主义应当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当作自己的宗旨。不仅如此,考虑到数码生物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的现实,数码启蒙主义将建设人与数码生物共处的新生态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以智能机器人开发为例,数码启蒙主义借鉴生态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确立如下基本原则:(1)智能机器人应当是人类的助手和/或朋友;(2)人与智能机器人的交互应当在互惠的条件下进行;(3)智能机器人的崛起应当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上述原则已经逐渐成为近年来科幻作品构思的重要切入点。以第三条为例,美国影片《环太平洋》(Pacific Rim, 2013)所描写的机甲战士有单人、双人、三人驾驶等不同型号。因单个人无法承担传感系统所造成的心理重负,

采用正副手协作控制机器人左右脑的方式比较有效。两个人之间必须以通感达成默契。该片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前提:人机交互的成功依存于人际交互。美国影片《极乐空间》(Elysium, 2013)则从反面做文章。它有这样的描写:为维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富人诉诸强大的机器人技术。机器警卫严格监视地球居民,主人公马克斯在准备上公交车时仅仅说了句背包“装有美容工具”的玩笑话就被它们打折了手臂。机器警卫也担负保卫娱乐空间的义务,对非法移民大开杀戒。不过,它们毕竟是按程序办事,因此,当系统重启、人人获得娱乐空间合法身份之后,即使总统下达抓外来移民的命令,它们也不听了。因此,社会平等的实现是依靠整个系统的变革。当然,人类若能将数码生物打造成自己的诤友,那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英国电影《博士之日》(The Day of the Doctor, 2013)是世界最长科幻系列电视剧《神秘博士》50周年特别篇。它描写了时间领主族将军和机器人生命体戴立克的冲突。为使二者避免同归于尽而提出忠告的,竟然是终极武器“星系吞噬者”(galaxy eater)的人格化身。

概言之,数码启蒙主义既是以计算机为龙头的信息革命的产物,又为上述革命的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数码启蒙主义认为:(1)尽管大自然、人类社会与自我之谜的求解过程依然是长路漫漫,但计算或计算机所包含的观念或原理确实已经提供了某些颇有价值的解释或参照系,这种解释中没有超自然力量的地位。(2)尽管艺术的概念始终是历史的,其外延和内涵总是随着具体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数码艺术确实已经为数码革命所催生,并逐渐为公众所熟悉。它对于启蒙的价值必然随着数码革命的深入、艺术教育的发展而得以显现。(3)尽管生命、生态、生物圈堪称历史悠久,但人工智能、人造生命、基因工程等信息科技无疑正在给它们带来意义深远的变化。人类如何在和计算机的交互中使自己得以完善,并且教化其他可能存在的智能生物,这是科技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应共同关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BERDYAEV N A. The religion of resuscitative resurrecti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mmon task of N. F. Fedorov [EB/OL]. [2009 - 10 - 02]. http://www.berdyaev.com/berdiaev/berd_lib/1915_186.html.
- [2] 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记[M]. 张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3] GUERRA C G. The mechaniza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human aspects of music[G]//MIRANDA E R. Readings in music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2000.
- [4] COHEN P. Humanities 2.0: A new enlightenment: digital keys to the humanities' riches [N]. New York Times, 2010 - 11 - 17.
- [5] MORRIS A. New media poetics: As we may think/How to write[G]//MORRIS A, SWISS T. New media poetics: Contexts, technotexts and theori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 [6] 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M]. 车槿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7] EDIS T, SAOUMA B. Rejecting materialism: Responses to modern science in the muslim middle east [R].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History,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eaching, 2014.
- [8] ASCOTT R. Is there love in the telematic embrace? 1990 [G]//SHANKEN E A. Telematic embrace visionary theories of art, technology and consciousness by Roy Ascot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9] DUNCAN R, CONOR L, KWAMENA A, et al. Return of the man-machine interface: Violent interactions[G]//Advances in computer entertainment,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8253.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3.
- [10] GRENVILLE B. The uncanny: Experiments in cyborg culture[M]. Vancouver: Vancouver Art Gallery and Arsenal Pulp Press, 2002.
- [11] 拉·梅特里. 人是机器[M]. 顾寿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12] MURI A. The enlightenment cyborg: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control in the human machine, 1660—1830[M].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3] 李慧, 王晓勇. 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 107 - 111.

Three approaches to digital didacticism

HUANG Mingfen

(Chinese Department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China)

Abstract: Digital didacticism not only inherits the theoretical courage and sense of social miss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 but also envisages challenges faced by traditional didacticism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It does its best to capture new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fth information revolution which takes computer as a symbol , and integrate the public value orientation , arts education concept and principles of heterogeneous accultur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Being Digital. It states that above-mentioned information revolution certainly is a new chance for the wisdom and progress of human ,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ideological influence of the East on West , young man on old man , rural on the city;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s play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current art education , with regards the Enlightenment as a process for every member of society to receive education and practice self-updating continually; that digital art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liminate vice and exalt virtue , and strive to cultivate artistic talent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accomplishmen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accultu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pecies , with the intention to ensure humans to adapt changes brought by the appearance by digital life in the near futur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how to promote artificial enlightenment to digital organisms as soon as possible , with the purpose to creating and building new ecology of mutualism between of human and digital creatures.

Key words: information revolution; didacticism; art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责任编辑: 刘 云)

· 简讯 ·

本刊获 2014 年度省直重点社科理论期刊“优秀栏目”二等奖

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的 2014 年度省直重点社科理论期刊评审中,《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栏目获得 2014 年度省直重点社科理论期刊“优秀栏目”二等奖。此次评审在全省社科理论期刊中共评选出“优秀栏目”13 个,其中一等奖 5 个,二等奖 8 个。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依托学校信息文科特色,于 2005 年设置了“网络媒体进展”栏目,2013 年更名为“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该栏目站在网络社会的理论前沿,围绕信息网络发展引发的网络社会治理、网络舆情调控、网络伦理与法规、网络传播与教育、网络文艺、互联网经济、网络信息安全等新事物、新问题,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讨论。栏目特色凸显,吸引了众多学者为该栏目撰稿,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